

农村政治夜校

“四人帮”是由一伙新老反革命结成的黑帮

1977

湖北人民出版社

“四人帮”是由一伙新老反革命结成的黑帮

（《农村政治夜校》一九七七年第七本）

中共钟祥县胡集公社委员会理论组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咸宁地区印刷厂印刷

1977年6月第1版 1977年6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3106·591 定价：0.08元

目 录

一、“四人帮”究竟是一伙什么东西.....	2
张春桥是国民党特务分子	2
江青是叛徒	7
姚文元是阶级异己分子	11
王洪文是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	15
二、“四人帮”怎样掩盖自己的反动历史	19
长期隐瞒反动历史	19
查抄收缴反动历史材料	23
私自密藏反动历史材料	24
大量销毁反革命罪证	24
残酷迫害革命群众和知情人	25
三、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	30

“四人帮”是由一伙 新老反革命结成的黑帮

中共钟祥县胡集公社委员会理论组

深入揭批“四人帮”，战鼓震天凯歌嘹亮。一九七六年十月，以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篡党夺权的阴谋，取得了伟大的历史性胜利。当前，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领导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抓纲治国，深入揭批“四人帮”，摘下了他们的一顶顶桂冠，剥开了他们的一层层画皮。现在已经查明，张春桥是国民党特务分子，江青是叛徒，姚文元是阶级异己分子，王洪文是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是蒋介石国民党的典型代表，地主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总之，他们是一伙反革命。而张春桥和江青则是由历史反革命到现行反革命的双料反革命。“四人帮”就是由这样一伙新老反革命结成的黑帮，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揭发的大量事实告诉我们，他们通过各种

复杂的渠道，千方百计打入中国共产党，同时，还采取种种手段掩盖自己反革命的真面目，钻进了党的领导核心。它还告诉我们，“四人帮”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扭转中国历史前进的方向，不是偶然的，是有着极为深刻的阶级根源和历史根源的。现在，进一步揭发他们的反革命面目和罪恶历史，对于我们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

一、“四人帮”究竟是一伙什么东西

长期以来，“四人帮”利用被他们把持的舆论工具，为自己歌功颂德，树碑立传，自我吹嘘“出身清白”、“一贯革命”。但是，现在已经找出来了大量的人证、物证，彻底揭穿了他们的反革命面目。

张春桥是国民党特务分子

“四人帮”的狗头军师张春桥，山东巨野县人，一九一七年生。他家祖辈三代都是官僚、地主，一贯依仗权势，横行霸道，无恶不作，是吃人肉、喝人血的豺狼。张春桥的曾祖父是清朝县衙门里的状班“老总”，包揽诉讼，欺压穷人；以后又当征收田赋的“八柜柜书”，横征暴敛，敲骨吸髓。张春桥的祖父在国民党统治时

期，当巨野县的田赋征收处主任。张春桥的狗父是个长期为国民党、日寇效劳的反动官僚、汉奸，先后担任过军阀张宗昌的县邮政局长、国民党少校军医、日伪警察局庶务主任、军医主任、国民党济南戒烟院院长等多种反动职务。张春桥的主要亲属中有二十二人都都是反动官僚、地主和富农出身。他们是一个上通清朝和蒋、日、伪官府，下结地痞流氓，盘根错节，残酷压榨劳动人民的反动官僚世家。

巨野县解放前三年内，张春桥家里有土地八十五亩九分，全部出租；还有宅基、花园、菜园四千一百多平方米，房屋二十二间。张家祖孙几代衣食住行全由佣人、丫环、奶妈侍候。他家剥削穷人残酷狠毒，收租一律按三七开，佃户辛苦一年打下的粮食，三分给佃户，七成归地主，真是吃人不吐骨头。每年外借种子时，张家又高利盘剥，借一斤秋后还四斤，逼得穷人没法活。有个名叫王秀业的杂役，年轻力壮进了张家院，挨饿受累三十年，最后被榨干了血汗，累弯了腰，惨死在杂役棚里。他家对丫环、佣人开口就骂，动手就打。有个名叫贾莲阁的丫环，从十三岁起就到张家当牛做马，起五更睡半夜，累得死去活来，稍不如意，就拳打脚踢。有一次，张春桥的地主婆母亲诬赖贾莲阁偷了她家三吊钱，把她毒打了三天，罚跪三个晚上。三九天，硬逼着贾莲阁上房顶扫雪，可怜贾莲阁穿得破衣烂衫，冻得直打颤，这个地主婆和张春桥

却在在一旁狞笑取乐。贾莲阁的手脚从此冻残废了，至今还有伤痕。张春桥就是在这样一个毒窝里吸毒汁长成的一条眼镜蛇。他从小就有丫环侍候，是一个干尽坏事的“恶大少”。他折磨小丫环，殴打穷孩子，放狗把佃户儿女咬得鲜血淋淋，活象歌剧《白毛女》中的黄世仁。鱼恋鱼，虾恋虾，乌龟爱的是王八。张春桥找的老婆也是一个叛徒、日本特务。

早在三十年代初，张春桥在济南正谊中学读书时期，就充当国民党特务。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四年，他在国民党特务分子校长、训育员等人的指使下，在学生中明里伪装进步，暗中监视领导反蒋抗日的学生运动负责人和积极分子，把学生运动情况向国民党特务组织告密，破坏学生运动，迫害革命者。一九三三年，进步学生利用学校周会散发传单，鼓动罢课，要求抗日，张春桥立即把学生运动六名领导人的情况向学校反动当局告密。由于他的无耻告密，使这六名革命青年遭到迫害，其中一人被判刑，受到严刑拷打，牺牲在狱中。就在这年春季，国民党复兴社分子在济南发起成立法西斯蒂组织华蒂社，由复兴社出钱创办了《华蒂》月刊。张春桥是华蒂社的发起人之一和骨干分子。他积极为华蒂社发展组织，大写反动文章，进行反动宣传。所谓“华蒂”，即“中华法西斯蒂”，它以“拥护蒋介石，反对共产党”、在中国实现法西斯主义为宗旨。张春桥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忠实走狗。正当日

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时候，张春桥拚命为日寇侵略大唱赞歌。一九三四年十月，他在上海《中学生》杂志上抛出了一篇名叫《济南》的反动文章，借介绍济南地理、名胜为名，把在日本法西斯控制下的济南，描绘得异常“太平”、“安全”，说什么“过去的济南“颇为荒凉”，“现在突飞猛进”地“好起来了”，简直把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下的济南描绘成了“人间天堂”，公然鼓吹“共存共荣”“中日提携”的卖国滥调，无耻地吹捧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有功”、“屠杀有理”。充分暴露了张春桥认敌作父、甘当汉奸的丑恶嘴脸。

一九三五年五月，张春桥从济南窜到上海，混入左翼作家队伍，在国民党复兴社特务、反动报纸《大晚报》副刊《火炬》主编崔万秋的指使下，从事文化特务活动。他猖狂反对毛主席制定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路线，追随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鼓吹阶级投降和民族投降，打着“国防文学”的破旗，经常发表反动文章，充当围攻鲁迅和左翼文艺运动的凶恶打手。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五日，他化名“狄克”，在《大晚报》副刊《火炬》上发表《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的反动文章，疯狂攻击伟大的革命家鲁迅，受到国民党文化特务崔万秋连口称赞，说他“文章写得不错”。

一九三七年九月，张春桥离开上海，返回济南，在国民党山东省复兴社头子秦启荣的指令下，由另一个复兴社特务分子掩护，在这个特务家里隐蔽了两个多

月，伺机潜入革命根据地。临行前，他对掩护他的这个国民党特务说：“你留下干吧，我到延安看看如何，如果干好了，就干下去，如果干不好，就回来再找你。”张春桥穿上济南市警察局长送给他的大衣，于一九三八年一月混入革命圣地延安。同年八月钻进党内。他到延安后，继续进行拥蒋反共、投降卖国的反革命勾当，根本不顾毛主席当时发出的“在党内在全国均须反对投降主义”的严厉警告，在叛徒丁玲主编的刊物上发表一篇名叫《韩复榘》的反动文章，竭力吹捧国民党反动派头子蒋介石，公然鼓吹向国民党反动派全面投降。胡说什么“蒋委员长领导下的国民政府”有“抗战的决心”，什么“诚心诚意地拥护蒋委员长，承认蒋委员长是中华民族抗战建国的领袖”，并提出什么“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武装、统一供给和统一作战计划”等反动主张，妄图把共产党的武装“统一”到国民党反动派那里去，真是反动透顶。

张春桥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是一副奴才相，而对工农大众却是一副极端仇视的老爷面孔。他在《俺们的春天》等一连串的黑诗黑文中，咒骂工人是“黑鬼”、“野狗”、“犯人”、“象件死了的机械”，咒骂农民是“永远肃清不了的匪患”，诬蔑逃荒到城市的农民象“一条狗似的蜷伏在那里”。张春桥这样恶毒地攻击和咒骂工农，证明他早就是工农大众不共戴天的敌人。

在三十年代，张春桥仅以“狄克”、“春桥”、“张春

桥”署名发表攻击共产党、攻击鲁迅，吹捧帝国主义、蒋介石，美化地主资产阶级，诬蔑丑化工农的反动黑文就有九十篇。可见他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国民党蒋介石的忠实走狗。

江青是叛徒

反党分子江青，本姓李，叫李云鹤、李云古、蓝苹等，一九一四年出生在山东省诸城县的一个地主家庭，家庭主要成员都是有严重历史罪行的家伙。江青的祖父、父亲都是奸诈刻薄、横行霸道的坏家伙。江青的生母是一个臭名远扬、心狠手辣的老板娘。江青的哥哥在北洋军阀部队当过兵，后来在日伪和蒋匪警察局当过警察、警长、巡官、局员、庶务主任和副官等反动职务达二十八年之久，是个有历史罪恶的特务、反革命分子。江青的姐夫在北洋军阀时期当过少校副官、税务主任，以后在天津开设北亚汽车行，上通富户豪门，下结地痞流氓，是一个恶贯满盈的兵痞、恶棍和反动资本家。江青的父亲李德文，开了二十多年的旅店和木匠铺，有房子和敞棚二十间，常年雇有三个干粗活的伙计，每年逢集赶山，还要雇上四五个短工。有两个盲人，经常被他家用低价雇来推磨，干一天活只给二百铜钱、四个黑麸饼。江青家从一九二一年起出租土地一百二十亩，残酷压榨贫苦农民。佃户每亩地约打二百八十多斤粮食，就被她家剥削去二百四十多斤，每

亩地外加土地钱。李家收租还另立章程，只收麦、豆、谷，别的粮食一概不收，而且规定三不要：粮食不干不要，不好不要，不净不要。李家收租的斗特别大，一斗能盛十一升，还用烧凹了的刮斗板来刮，每斗都得刮上个尖。收柴草的秤一斤二十四两。不论好坏年景，不能少交一斤粮一斤草。到期不交就要夺佃卡脖子，恨不得一口气把佃户的血汗喝干。群众都叫江青的老子“李饿狼”。他不仅对佃户十分凶残，就是对亲兄弟也胜过豺狼。李德文的亲兄弟李德顺，穷得少房无地，狠毒的李德文一心想发财致富，把李德顺弄到他家当伙计，干一年活只给吃，不给工钱，弄得李德顺家里越来越穷，一家人四处逃荒，妻离子散。什么藤结什么瓜，江青就出生在这样一个剥削成性、心狠手毒、无恶不作的罪恶家庭。她从小过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寄生生活，是远近闻名的“阔小姐”。她家有权有势，仗势欺人，横行乡里。有一次，江青和邻居的孩子吵了架，第二天，她那当匪兵的哥哥就领来二十多个匪兵，用铁耙把那个孩子的父亲打得皮开肉绽，死去活来。那孩子的叔父只说了几句愤恨不平的话，也遭到毒打，抬回家不多时，就含恨死去，婶婶被迫改嫁，弄得家破人亡。可见，江青一家都是劳动人民的死对头。

再看看江青反共、反人民的罪恶历史。一九二六年，她到天津，住在她的反动姐夫家，仍然过着剥削

阶级的寄生生活。一九二九年，江青在济南进入山东省实验剧院，为国民党反动派歌功颂德，深得这个剧院院长、国民党官僚的赏识。一九三一年，她由这个国民党官僚出钱，送到青岛大学当旁听生。“九·一八”事变后，青岛大学在我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绝大多数学生积极参加了抗日救亡赴南京请愿团，而江青却反对请愿，反对罢课，暴露了她投降卖国的可耻嘴脸。

一九三三年二月，江青加入共产党。不久，她的入党介绍人被捕，她又跑到十里洋场的上海，失去了党的关系。这年秋天，江青在上海加入“左翼教联”和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二年十月，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机关逮捕。她贪生怕死，奴颜婢膝，入狱不久，就自首叛变，成为可耻的叛徒。这条断了脊梁骨的癞皮狗江青，在“自首书”中攻击“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叫嚷“反对共产主义”，“拥护三民主义”，并赌咒发誓：“以后决不参加共产党”。于是，她得到特务机关的优待，住进了小监房（又称优待室）。在小监房，她经常与特务头目鬼混，夜里陪他们喝酒、唱京戏，还送给他们剧照。江青在狱中呆了两个月，国民党特务机关就把她从狗洞里放了出来。

江青自首叛变出狱后，正是张春桥在国民党特务分子崔万秋指使下，从事文化特务活动的时候，江青不仅结识了崔万秋，而且常和崔万秋来往，关系很深。崔万秋主编的反动报纸《大晚报》副刊经常发表文章，

刊登剧照，吹捧江青是什么“典型的北国女性”，山东戏剧运动的“功臣”。

三十年代，正是我国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激化的时期，蒋介石面对日寇的加紧侵略，采取不抵抗的投降政策，积极反共。这时，江青在上海名剧团和国民党官办的电影制片厂，大演“国防戏剧”、“国防电影”，鼓吹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死心塌地为蒋介石反共卖国效劳。

一九三六年九月，国民党反动派为蒋介石“五十寿辰”大搞庆典，凑集七八百万元巨资购买战斗机、轰炸机八十多架，作为给蒋介石的“寿礼”。在上海电影界的“购机祝寿游艺大会”上，江青粉墨登场，大唱国民党党歌，演出独幕剧《求婚》，为蒋介石国民党“剿共”募集资金。一九三六年十一月，江青参加演出的“国防电影”《狼山喋血记》公演了。这个影片打着宣传抗日的幌子，实际上炫耀日本帝国主义军事实力，抹杀阶级矛盾，美化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统治。在拍摄外景时，江青十分卖力，摔坏了两颗牙齿。而事后她却把这个为王明路线卖命留下的伤痕，捏造为是“从小就革命”，被地主“打坏的”，真是无耻至极。与《狼山喋血记》上演的同时，江青又争演赛金花。话剧《赛金花》，是鼓吹投降卖国路线的又一个黑标本。剧本全力歌颂了一个极端仇视人民，背叛民族利益，将灵魂和肉体出卖给帝国主义的汉奸妓女赛金花。当这个鼓吹投降卖国的剧本一出

笼，立即受到鲁迅的尖锐批判。可是，江青不仅大吵大闹，拚命地要争演赛金花，还大写文章，鼓吹《赛金花》是一部“很有意义很优秀的创作”。今天，我们只要翻开三十年代反动报刊，就可以看到江青为人民公敌蒋介石献机祝寿的剧照和美化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文章。

就是这个一贯对抗毛主席革命路线，追随王明投降主义路线，忠实为蒋介石国民党卖命的可耻叛徒江青，隐瞒历史，伪装进步，于一九三七年秋天混进了延安。

姚文元是阶级异己分子

阶级异己分子，就是钻进革命队伍内部的出身剥削阶级家庭而又顽固坚持反动立场的阶级敌人。“四人帮”中的反动文痞姚文元，就是这样一个阶级敌人。

姚文元是浙江省诸暨县人，一九三一年出生于地主兼资本家家庭。家里五代都是大地主，长期出租土地、房屋，放高利贷，雇工剥削。解放前，他家占田一百一十亩，有楼房九间，平房三间，是姚公埠附近二十户地主中最大的一户，每年出租土地八十多亩，每亩每年收租三石左右，还雇长工一人，短工五到七人。姚家剥削贫下中农的手段极其毒辣。在姚江地区，至今还流传着这样的口谣：“蓬子老爷的斗，是毒蛇的牙齿，饿狼的嘴。”不知吸了贫下中农多少血汗。当时遇到灾荒年，往往收成很少甚至颗粒无收，而姚家却规定佃户

每亩地交租一粒不能少。曾经被姚文元后来供养在上海的地主婆祖母，就是一个十分阴险毒辣的老吸血鬼。她经常亲自出门催租逼债，敲诈勒索，对佃户们张口就骂，伸手就打。佃户交不起租，她就马上将租田收回，逼得贫下中农走投无路。姚家对长工十分凶残，逼迫长工常年起五更，睡半夜，一个人替他家耕种二、三十亩地，到年底时，看到这个长工身体被摧残，血汗被榨干，就一脚踢开，重雇一个。因此，姚家的长工不长，总是一年一换。有一次，长工茅龙泉挑重担时，脚被树桩戳破，化脓溃烂，姚文元的地主婆祖母见他不能劳动了，就起了狠心，不但不给医治，反而诬赖茅龙泉偷了她家一百元钱，制造罪名把他赶了出来。茅龙泉在姚家累死累活地干了半年，一分钱也没有拿到，因为无钱医治，结果烂掉了一只腿，成了终身残废。

正当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全国即将解放前夕，姚文元和他的反动老子姚蓬子心急火燎，急急忙忙赶回老家浙江姚公埠，假惺惺地把全村六十岁以上的老人请去吃饭，大摆什么“敬老酒”，妄图笼络人心，逃避斗争。土地改革时，他们一面写信给当地农会，说什么愿意把所有的土地、房屋全部“送给”政府和人民，一面却把家里的浮财和农具转移一空，还偷偷地把一座该没收的房屋也卖掉了。

姚文元的父亲姚蓬子，是一个剥削成性而且有严重罪行的叛徒、特务分子。姚蓬子一九二七年加入中

国共产党，一九三〇年三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时，他又混入左联，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在天津被国民党特务机关逮捕，关进了“反省院”。他在“反省院”里写了《姚蓬子脱离共党宣言》的反党黑文，被伪“中央社”公布出来。这是一篇卑躬屈膝、卖身投降、反动透顶的反党黑文。他在这篇黑文中咒骂共产党“毁坏农村、毁坏仅有的民族工业”，是“帝国主义的别动队”，诬蔑“共产主义之路、在中国已经成为一条悲惨的绝路”，宣称：“我完全放弃过去的政治立场、脱离中国共产党、自后决定站在三民主义的旗帜之下、为复兴民族文化、尽我个人的力量。”一九三四年四月，他从“反省院”的狗洞里爬出来，转过头来向共产党和革命人民疯狂反扑，在国民党中央特务头子徐恩曾领导下充当文化特务，担任国民党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委员、国民党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委员等反动要职，并且从中统特务机关领取津贴，长期进行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罪恶活动。抗日战争爆发，他跟随国民党政府从南京逃到重庆。抗战胜利后，又从重庆窜到上海，投靠伪上海警备司令宣铁吾，经营“作家书屋”，用“美援”廉价新闻纸大搞投机倒把。姚蓬子不仅从小对姚文元灌输各种反动思想，而且，当姚文元五、六岁时，就把姚文元拜给国民党中央特务头子徐恩曾和徐恩曾的小老婆、叛徒费侠做干儿子，两家结成“干亲家”，关系十分密切。解放以后，姚蓬子仍然顽固坚持反动立场，与胡风

等反革命分子关系极为密切，他们经常在一起攻击共产党。可是，大耍反革命两面派的姚文元，对姚蓬子与胡风在他家里攻击、谩骂我们党的罪行，不仅不报告，不揭发，反而欺骗党和人民，吹捧胡风是“进步”的，姚蓬子在“政治上拥护共产党”。

姚蓬子死后，姚文元竭尽“孝子”之情，痛哭流涕，继承了姚蓬子除存款以外的全部家产，也全盘继承了他反动老子随机应变、投机钻营、舞文弄墨的反革命本领，是一个混在革命队伍内二十多年的阶级异己分子。早在文化大革命前的历次政治斗争中，他都站在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上，利用杂文、文艺评论，肉麻地吹捧胡风、周扬、彭德怀等，诬蔑鲁迅，猖狂攻击党，攻击社会主义。一九五七年，姚文元配合资产阶级向党进攻，写了许多反党黑文。他咒骂党的领导干部是“高人一等的贵族”，使党群之间“筑起高墙深沟”，并狂妄叫嚣要党“放下架子”、“拆墙填沟”，妄图搞垮共产党。一九五八年，他发表黑文吹捧彭德怀有“纯洁的党性”、“铁一样的革命纪律”、“卓越的指挥艺术”等等。接着，当刘少奇、彭德怀一伙恶毒攻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时候，他大写黑文紧密配合，诬蔑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是没有“坚实基础”的“空中楼阁”，妄图配合他们砍倒三面红旗。多年来，姚公埠有些地富反坏分子经常鬼鬼祟祟地窜到姚文元家里，姚文元把他们待为座上宾，他们把姚家当作